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办

姚大力 刘迎胜 主编

清华元史

第三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清华元史

第三辑

姚大力 刘迎胜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元史. 第三辑 / 姚大力, 刘迎胜主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770 - 8

I. ①清… II. ①姚… ②刘… III. ①中国历史—元
代—文集 IV. ①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179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清华元史

第三辑

姚大力 刘迎胜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770 - 8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3 3/4

定价: 88.00元

目 录 Contents

论 文

- 陈得芝 《元史·世祖本纪》之“忒刺”考
——忽必烈征大理往返路线考辨补缀 3
- 陈高华 再说元大都的皇家佛寺 16
- 王晓欣 魏亦乐 元公文纸印本史料初窥
——宋刊元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所存
部分元代资料浅析 77
- 刘 晓 元浙东道“沿海万户府”考
——兼及“宿州万户府”与“蕲县万户府” 97
- 党宝海 外交使节所述早期蒙金战争 159
- 丁 一 汉藏两隔
——元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的文献及宗教背景 188
- 李春园 元代华北的民户税粮政策再探 241
- 鲁西奇 说“越” 277
- 李 辉 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 353
- 特木勒 将帅家丁与明蒙关系
——前近代内亚游牧—农耕关系重审 387

评 论

- 马大正 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 421
- 黄韵之 李辉 遗传学和语言学证据指向匈奴属于
叶尼塞语系人群 435

书 评

- 徐文堪 布拉泽克著，史瓦尔兹编《吐火罗语论集》 457
- 任小波 多特生、哈佐德《吐蕃纪年译注并附图说》 466
- 李春园 傅汉斯《马可波罗在中国：来自货币、盐业和
财政的新证据》 475
- 姚大力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485

《清华元史》稿约 534

论文



《元史·世祖本纪》之“忒剌”考

——忽必烈征大理往返路线考辨补缀

陈得芝（南京大学）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学界诸贤就忽必烈征大理行军路线问题发表过多篇专论，相关的地理、时间和过程多已有比较清晰的论述，本毋庸赘言。笔者在做《元史·世祖本纪》会注考证过程中仔细阅读前人著述，受益良多，但还是有若干未能通解的问题，有一些补充或商榷的意见，提出来求教诸家。为了讨论方便，仍然需要先將两条大家都熟悉的主要资料引述如下：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壬子（宪宗二年，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赍牙西行。岁癸丑（1253），受京兆分地。……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朮、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至忒剌，分三道以进。……帝由中道。乙巳，至满陀城，留輜重。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朮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庚子，次三甸。……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以下记述进入大理，知三使遇害。追击其权臣高祥，

癸亥，获之，斩于姚州（今姚安）。留兀良合带戍守，遂班师。

《元文类》卷二三程钜夫《平云南碑》：“岁在壬子，我世祖以介弟亲王之重，受钺专征。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今陕西延安）、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与陕西靖边县交界处白城子古城），四月出萧关（在今宁夏隆德县东北），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大渡河，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台经略之，上振旅而还。”

这两条资料互有详略，《世祖本纪》于“师次临洮”以前记载甚略，而特详于此后的行程，《平云南碑》则详细记载前段行程，即从出师至次年驻夏六盘山所历各地。两者也略有歧异。《世祖本纪》谓壬子年七月祭旗出师，《平云南碑》则作九月出师。按，忽必烈于壬子年春南驻金莲川（今滦河上游），入夏后北上觐见蒙哥于曲先恼儿，此地当即拉施都丁《史集》所载窝阔台合罕秋季营地 *Kusheh nauur*，其地距离和林四日程，疑即《元朝秘史》第一五一节所载之曲薛兀儿泽（*küsheür naur*），当在和林东南、戈壁之北、土拉河—克鲁伦河上游西南^[1]。按《国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世隆）》引《墓碑》载：“上（世祖）在潜邸……壬子岁，自漠北遣使来征公，见于日月山（祭天处，克鲁伦河源肯特山南）之帐殿。上方治兵征云南，问此行如何。”据此知忽必烈于七月受命后，在漠北整備军队，实际出师时间应是《平云南碑》所载的九月。十二

[1] 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Khan*），第254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蒙古、克烈诸部幅”。

月渡过黄河，次年（癸丑）春，穿越河套地区，经停盐州（商挺应召至此觐见）^[1]夏州；四月，过萧关，到达六盘山驻夏；八月（未载日期），进至临洮。

此后的行程，《世祖本纪》记载颇详，可与《平云南碑》互证。《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到临洮后派出三使者去大理招谕，但“不果行”。《平云南碑》则说忽必烈在踰吐蕃境分军三道时遣使谕大理，但“道阻而还”。敝见以《世祖本纪》所载从临洮遣使为是，临洮是大军出境远征的前沿基地，遣使招谕探明大理态度，是决定征进战略的先行步骤。至于使者“不果行”的原因，当依《平云南碑》所载，系“道阻而还”。据《元史·郑鼎传》的记载（见下文）推测，使者可能是在进入吐蕃境时受其某部族阻扰而折回。《世祖本纪》载九月壬寅（二十六日）师至忒刺，分军三道，《平云南碑》称“踰吐蕃，分军为三道”，按临洮路南境与吐蕃诸部境接界^[2]，而且本是吐蕃部族居地，故两者所指地理位置实同；《世祖本纪》载自忒刺分军，忽必烈即统中道进，《平云南碑》则置于过大渡河后，此乃特叙世祖事，与忒刺分军的记载并不冲突；抵达大理边界，《世祖本纪》记载渡金沙江，《平云南碑》作“渡泸”，泸水为雅砻江、金沙江合流后的名称，窃以为忽必烈军所渡应为金沙江，而非攀枝花市以下之泸水，程钜夫将金沙江并称泸水，如此则也不矛盾。

史料中的重要缺陷是，《世祖本纪》和《平云南碑》都没有记载大军从临洮出发的日期。笔者推测忽必烈在临洮当驻留过一段时间以整备军队及行军供应事，可能还在等候使者回报。《元史·宪宗

[1] 参见《元史·商挺传》。

[2]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金京兆府、凤翔、临洮诸路幅”。

本纪》所载“(二年)八月,忽必烈次临洮,命总帅汪田哥以城利州闻”,此系误将三年事记在二年。《陇右金石录》卷五所收《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载:“癸丑,诏公城益昌,诸所屯戍皆听公节制。时今上皇帝为皇太弟,将有事于西南,公入见,首言益昌之事,祈免徭役,捐课税,运粮屯田为久贮之计。所请悉从,即命置行部于巩,设漕司于沔,造楮币,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元史·汪德臣传》所载略同。忽必烈是在到达临洮后(并非在六盘山时)命令奉旨修筑利州城的汪德臣(即汪田哥)前来报告。他在临洮还召见了当地藏族首领、叠州安抚使赵阿哥潘,命其“城益昌”^[1],当即协同汪德臣修筑利州城,并保障征大理军的后方安全和物资粮饷供应。据此推论,忽必烈在临洮当停留较长时日,在使者“遇阻而还”之后启程进兵,估计已至九月中旬或更晚,到达忒刺的日期遂至九月壬寅(二十六日)。《世祖本纪》和《平云南碑》记载从云南班师的时间也有歧异:《本纪》附记在癸丑年十二月之末,《碑》记为“明年(甲寅)春”,无疑应以《平云南碑》的记载为准。

忒刺今地所在是考察忽必烈征大理行军路线首需解决的问题。屠寄《蒙兀儿史记·忽必烈可汗本纪》于“忒刺”下小注称:“疑即秃刺蛮之地,在叙州西。”按,秃刺蛮又作土老蛮,即元李京《云南志略》所记土獠蛮,分布在“叙州(今四川宜宾)南、乌蒙(今云南昭通)北”一带,和位于临洮之南、大渡河之北的忒刺毫无关系,屠说明显错误。有学者将忒刺定在今四川松潘^[2],方向大体是对

[1] 《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潘传》载,本土波思乌斯臧掇族氏,世居临洮,先归附宋朝,赐姓赵。后附金,官至熙河节度使。金亡,其父阿哥昌归附蒙古,阔端承制命为叠州安抚使。阿哥潘袭父职。

[2]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初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

的，但未举证说明。笔者在撰写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第二章“忽必烈灭大理”一节中就采用此说，竟不知1948年刊行的吴景敖先生所著《西陲史地研究》中载有《元代平滇征缅甸路线》篇；《元朝史》出版后，又有学者著文研究忽必烈征大理路线，笔者也没有一一阅读，以致2008年《元朝史》再版时仍未对此处进行修订，实属鲁莽灭裂，难以仓促自辩。写这篇短文作为拜读诸家论著的体会，冀能略为补救前失。

六十多年前吴先生就根据实地考察将忒刺之地定于今甘南州洮河之阴、叠山之阳的“达拉沟”（迭部县境）。他的依据是：“达拉”系蒙古语，意为旷野，为较宽广之谷地平原的通称；该地是甘肃与四川间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地处白龙江之南，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宜于驻兵征进；达拉沟一带尚有当年蒙古军队经行此地的残留迹象，其蒙裔及蒙语地名“必为平滇元兵南下时所播植”。诚如陈世松先生所说，吴先生精于实地考证，断定忒刺的具体位置即是一大贡献。^[1]

“达拉沟”地名的起源和语义姑置不论（与“忒刺”音不全合，且此说未举史料证明），将《元史》所载“忒刺”之地定于甘南的迭部县境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还有其他重要史料可以进一步证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1卷第2期（2005年4月）刊发的邹立波撰《“忒刺”考辨》引述了藏文《萨迦世系史》^[2]所载八思巴与忽必烈六盘山会见以后事：“汗王（忽必烈）率军前往云南时，上师八思巴前

[1] 陈世松：《忽必烈征滇过蜀路线考辨》，《四川历史研究论文集》，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高禾福等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去凉州为法王（萨班）灵塔开光。按法王之遗言，准备到乌斯藏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因而他前往朵甘思，从来往各地的客商中得知伍由巴已于牛年（1253）去世的消息，故而返回。此时，汗王亦返回，于是一同回到汉地，驻于汉蒙交界处一条大河旁边的一个名叫忒刺的地方。”^[1] 这的确是解决忒刺定位问题最重要的史料，特别要感谢汉译者将 The-le 译写为见于《世祖本纪》的“忒刺”，这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藏汉文献勘同，只是原文“汉蒙交界处”应该订正为“汉藏交界处”。下面我将申述提出这个订正的理由。

结合《世祖本纪》与《平云南碑》的记载可知，元军于九月壬寅（二十六日）师抵忒刺，自此分兵三道进军，“逾吐蕃”，可见忒刺之地应在临洮路南境与吐蕃境接界处。从此地启行，乙巳（二十九日）至满陀城，留辎重，轻兵前进，次日即过大渡河，进入山谷地带，行二千余里，到十一月辛卯（十六日），渡过大理之北四百多里摩娑蛮主居地（今丽江）附近之金沙江。根据《世祖本纪》所载的日期，忒刺至满陀城为三四日程，留辎重于此轻兵前进，第二天就过大渡河，仅一日程。从渡河处到达丽江东北之金沙江，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历时大约一个半月。《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所载的“忽必烈进兵大理图”标忒刺于松潘，将过大渡河前留辎重处满陀城标在泸定。但从松潘到泸定直线距离近七百里，非三天多行程可及；从泸定渡江到丽江东北之金沙江直线距离约六百里，按山谷曲折行程加倍计，也与“二千余里”不符。将忒刺定位

[1] 末句原文：Gyal-po tshur byon-pa dang lhan-cig-tu rGya-yul-du byon-nas/ rGya dang Hor-yul-gyi mtshams The-le zhes-bya-bar chu-bo chen-po'i 'gram/，民族出版社1986年刊本，第168页。

于松潘，满陀定位于泸定，不仅缺乏史料依据，单从里程看也难以成立。

从过大渡河到抵达丽江东北之金沙江，乃是忽必烈征大理途中一段最艰难而漫长的行程。《元史·郑鼎传》载：“庚戌（应为癸丑），从宪宗（应为世祖）征大理国，自六盘山经临洮，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尝背负宪宗（应作世祖）以行。敌据扼险要，鼎奋身力战，敌败北，帝壮之，赐马三匹。至金沙河，波涛汹涌，帝临水傍危石，立马观之。鼎谏曰：‘此非圣躬所宜。’亲扶下马，帝嘉之。俄围大理……大理平。”姚燧《牧庵集》卷十七《贺仁杰神道碑》则记载了忽必烈征大理往返路程：“初岁壬子，宪宗国母弟世祖于秦，受诏征云南，赍牙略畔之山（六盘山）。明年……经吐蕃曼陀，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途，前行者雪深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步行，有远逾千里外者。”这是两条有关忽必烈征大理途中，从过大渡河到达今丽江附近金沙江这段路程的最详细记载。此外，《元文类》卷六〇载姚燧所撰《姚枢神道碑》也记载了班师途中的艰苦状况，谓：“及归，马多道死，公惟一马，脊不可乘之，则牵之，襟谷数升，时摇木盂以饲。雪深三尺，军马所经，踏为冰梯，惟牦牛负橐以从。徒步仅千里而中原马至，分赆之，始免茧足。”往返路程所经行的这座难以翻越的雪山，显然就是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大渡河西之大雪山。从行程二千余里、历时一个半月来看，其过大渡河前留辎重之满陀城，当在今马尔康西北、红原县南境一带。“满陀”疑系梵文 manda（菩提

道场)译音,或因该地有大佛寺而得名。^[1]忽必烈亲率之中路大军过大渡河(应为上游大金川)处,按行程估计当在今马尔康县西、金川县北某段。

藏文《萨迦世系史》第三章第六节“八思巴传”有两处涉及忽必烈征大理路途的记载,上引邹立波文中已据其中一处考证忒刺方位。作者认为吴景敖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根据“达拉沟”地名及实地考察,而缺乏充分的文献资料。他结合汉藏文史料的分析,结论是忒刺之地应从临洮之南寻之,“大致在甘松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区”。此说方位大抵正确,但地域范围太广。笔者反复阅读《萨迦世系史》中的“八思巴传”有关记载,见此章记叙事件和引录文献前后混杂,并不严格按年代顺序。兹概述如下:

八思巴于牛年(1253)因薛禅汗之迎请前往宫中(据《汉藏史集》,应为“与凉州王子蒙哥都一起前去汉地,与驻在六盘山的薛禅王忽必烈见面”),答疑问难,讲论教法。忽必烈及王妃请授灌顶,八思巴称自己尚未受比丘戒,授灌顶无效,需先安排自己受戒事。行文至此,竟插进很长篇幅^[2]叙述后来八思巴为忽必烈三次授灌顶,以及忽必烈赐予他乌思藏十三万户、吐蕃三区等事,并全文抄录了鼠儿年(中统五年,1264)五月初一忽必烈于上都赐予他的“珍珠诏书”(’ja’-sa mu-tig-ma),接着又抄录了“阳木虎年(甲寅,1254)仲夏月(五月)初九写于汉藏交界之处河谷东”(shing-pho-

[1] 清人查礼《铜鼓书堂遗稿》卷二二有记述从阿坝归成都途程的《晓发曼陀寺入卓克采土司境》等诗,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四川幅”,卓克采土司即今马尔康南的卓克基,则曼陀寺或为其西北一处古寺。藏区寺院往往是人民聚居地,颇疑即《元史》之满陀城所在。此仅为推测,有待实地考察证明。

[2] 《汉藏史集》汉译本第108—118页,原文刊本第154—168页。

stag-gi byar-'bring tshes-dgu -la/ Gya Bod mtshams-kyi lung-pa-shar-du bris) 的“蕃字诏书”(' ja'-sa Bod yig ma)。在讲过这两道诏书对萨迦派的意义后,紧接着另起一段回叙八思巴与忽必烈六盘山初会以后事:“次年,汗王(指忽必烈)率军前往云南时,上师八思巴前去凉州为法王(萨班)灵塔开光。按法王之遗言,准备回乌思藏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因而前往朵甘思,于此从来往各地的客商处获悉乌由巴已于牛年(1253)身故(可见他到朵甘思已是1254年),遂返回。此时汗王亦返回,于是一同回汉地,驻于汉蒙交界处一条大河旁边名叫忒刺的地方”^[1]。

此段紧接阳木虎年仲夏月九日所赐“蕃字扎萨”之后的回叙文字,开头加有“次年”(de'i phyi-lo)一语,造成了诸多混乱。例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伯戴克(Lusiano Petech)在所著《元代西藏史研究》(*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中利用了《萨迦世系史》的上述记载,但他把八思巴在朵甘思与从云南班师途中的忽必烈相遇看成他们的初次见面,说八思巴受到了盛情接待,遂向忽必烈讲述藏佛教义,并伴随他来到 Mung-pa-shar(注言此名不详)之地,忽必烈遂于1254年5月27日授予八思巴“蕃字扎萨”(按原文阳木虎年仲夏月九日应为1254年6月6日)。L. Petech教授所讲的这个地名,显然就是民族出版社原文刊本之 lung-pa-shar(地域[河谷]东)。藏文字母 l- 与 m- 形近,也许他所据的本子将第一个字母 l- 误写为 m-, 因为所述事件的时间、地点完全正确。但他接着另起一段说:“次年,八思巴首先从朵甘思来到凉州向萨班灵塔献祭。当他返朵甘

[1] 《汉藏史集》汉译本第118页,原文刊本第168页。

思时，获悉乌由巴已于年前去世。再次遇见忽必烈后，他便伴随这位王子前往中国北方，驻足于大河（黄河）岸边中国与蒙古交界处靠近河州的 T'e-le，在那里他终于获得比丘戒而成为真正的僧人，这个仪式是在 1255 年 5 月 22 日完成的。”^[1] 此段文字开头的“次年”（in the following year）显然来自上引《萨迦世系史》的 de'i phyi-lo，却被理解成其前文已述及的八思巴与从云南班师的忽必烈相遇并随从回到汉地以后的另一次会见，并说他随忽必烈前往中国北方，到了“汉蒙交界处”的 The-le 之地，认为该地应在黄河边靠近河州（今甘肃临夏）处，从而与 1255 年八思巴在此处受比丘戒事搅在一起，并勉强解释河州之地也属于藏人所谓的 Hor（蒙古）之地。这一说法（包括将两人同驻于 The-le 之地的年代定为 1255 年）纯为误解。这大概是因为《萨迦世系史》将忽必烈出征云南直到在班师途中与八思巴相遇并共同北归这段跨越一年的事，都写在了所抄录的阳木虎年（1254）仲夏月九日颁发“蕃字扎萨”事的下段，并在开头用了“次年”（de'i phyi-lo）一语造成的。伯戴克先生将八思巴与从云南班师的忽必烈相遇看成第一次会见，又把原文紧接着所述他们一同回汉地驻于“汉蒙交界处”的 The-le 之地说成他们的再次会见，并将原文“汉蒙交界处”解释为“回到中国北方”（North China），而且将时间置于 1255 年，于是就和八思巴在河州附近受戒事联系起来，The-le 之地遂被置于河州附近的黄河边。把同书记载的同一回事分拆为二，不能不说是伯戴克先生这部优秀著作的一处小瑕疵。

从《萨迦世系史》长篇插录 1264 年和 1254 年（时间先后倒置）

[1] 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张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 页，原文刊本第 15 页。